

结构分析落伍了吗？

——基于经验现象的研究推进

张 静

内容提要：回应结构分析面临的挑战，本文试图说明，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社会学解析逻辑，结构分析深入历史经验现象，完成了从系统演绎到事实证明的转向。这表现在分析焦点的转移：从静态抽象到现实变迁、从前设关系到新角色涌现、从环境确定性到内生偶然性、从逻辑推断到经验证明，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本文举例若干研究文献，展现上述推进及其理论含义。

关键词：结构分析；系统演绎；事实证明；历史经验

如果我们要问，社会学提供的最有价值知识是什么？我认为，不是有关具体议题的结论，而是一种思维逻辑：结构分析。社会学提出了不少社会议题，但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民族学、宗教学、人口学、人类学及社会保障学同样可以做到；社会学有大量理论探索，但哲学、伦理学、神学、法哲学、政治哲学也在这么做；社会学关注过程案例和生命历程，但史学和文学讲的故事往往更生动；社会学运用大量的量化数据，但经济学、统计学、信息工程学、计算社会科学也是如此。社会学向不同科学学到很多，但也回赠了它不可替代的贡献：所有学科，如果想要了解社会现实对人类行为发生的影响，它们一定能从社会学的结构分析中获得启发。

比如，为什么有一种声音被人听到，有一种见解得到重视，能够成为制度法律或社会政策？结构分析不是停留在声音和见解的具体内容上，而是挖掘言者的社会身份特征，分析其所言和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力量的关系，揭示触发这些声音见解能够成为知识权威的机会结构。还比如，为何某现象在某地、某时发生？结构分析不是锚定单一起因，而是关注现象背

作者简介：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基地“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项目。

后系统化、组织化变量的推动。只有那些汇入了历史大势的、具有关键影响作用的、与公共及群体关联的共性因素，才被结构分析重视。他们相信，事件背后一定具有结构意义，对结构变化有影响的才可称得上是事件（张弛，2020）。要挖掘一系列现象的成因及其社会后果，非得具备结构性思维不可。

一、系统演绎与事实证明

作为一项经典的分析逻辑，结构分析面临很多挑战。广为流传的批评之一是还原论：在（帕森斯）著名的AGIL（调试、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系）框架中，行动彻底消失，由于每个子系统裂变为四个次系统，并遵循同样的系统逻辑，这一理论框架没有给行动者及其能动性留出多少空间（李钧鹏，2016）。系统演绎把结构设想为独立于人的变量——它是外在于人、约束人、剔除了行为和观念的抽象物。然结构僵死，人则灵活，为什么人非得按照结构（规则）行动？存在这样的人吗？由这样的抽象物组成的社会真实存在吗？

不得不说，也许早期的结构分析的确如此，它曾依赖理论推演，追求形式均衡的美感，但挑战激励了进步，现今的结构分析，已经不再满足于抽象演绎，而是涉足于经验现象和行动实践。最近几十年来，结构分析已经聚焦社会现象本身，通过人和组织的行为认识结构的存在。对于结构分析者来说，结构早已不是抽象演绎的，而是实践活动证明的，是由人的约定和行动组成的。比如，市场合约是一种结构，它界定了有关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关系；角色行为也是一种结构，它通过他人的社会预期显现，不存在没有人的角色，社会结构依赖不同角色的共识和关系维持获得巩固。对于这些新的结构分析，还原论的指责，如同“皇帝的新衣”，似来自施加者的想象，他们对结构分析的了解，还停留在帕森斯时代。

另一个常见的批评是静止论：“结构的隐喻意味着稳定，结构只能解释社会生活怎样变为与之协调的组成部分，而对这些部分如何变革不予讨论。结构论往往认为，变化在结构之外，例如历史终结或观念衰落，都来自系统外部施加的影响”（休厄尔，2012：122）。在这种批评看来，结构分析只适合处理稳定和协调现象，但对冲突和变迁的理解缺乏优势。果真如此

吗?即使从概率上看,结构分析处理的冲突和变迁议题,也大大超过稳定议题。有关变迁的社会结构研究,都在揭示撼动社会发生结构变化的历史动力,比如合伙人制的出现、新组织生成研究,主题都是结构关系转型,对于变迁“不予讨论”已经是过去式。

但这些批评促成了一种刻板印象:结构分析过时且很旧,给新的学习者带来无比踌躇:我会不会显得僵化古板?担心“形象不新”,作为一种思想负担蔓延,使社会学似乎正在失去对宏大主题的关注和曾经的厚度。这种放弃和价值错置,在于用抽象演绎、而非事实证明的视角误判结构分析,如果把结构限定为抽象的系统演绎,就难以看到大量历史经验研究对于结构分析的推进。

系统演绎与经验证明的差别,表现在从逻辑需要出发还是实践经验出发,追求系统均衡还是发现并解释转型、涌现和突破。系统演绎的结构分析,意在讨论给定条件中的行为选择问题——人如何适应环境,但没有解答新的角色、行为、组织和关系结构的出现——它们为何以及怎样出现?系统演绎的结构分析受到生物学思维影响,将一系列组织角色和关系形态的出现——比如,“银行,科学机构,国家,政治等组织”,视为选择性进化,属于已有物种的形态转化(Padgett and Powell, 2012),而不是性质不同的关系、组织和结构创生。在系统演绎中,更新如同出生,虽是新的但却有母体,类似于从有到有的换代,不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在这种理解下,组织创新理论……从未指向组织化的行动者本身。他们只阐释已经存在的组织如何演化及生存,不关心新组织的出现、重新组合排列、以及对后继走向产生的关键性影响(Padgett and Powell, 2012)。不关心影响,可以解读和阐释,但很难真正进入解释,这是旧与新的结构思维表现出的不同取向。

新的推进基本结束了旧的结构理解,因为它使结构分析限于停滞,妨碍其捕捉丰富实践的敏锐能力成长。如果把眼光放到现实世界,不难发现很多系统演绎的标准结构已经发生质变,不断出现新的社会“物种”。比如,十三世纪的国家形成和金融资本主义组织,十四世纪的公司合伙人组织,十七世纪的合资公司组织,十九世纪的政党组织……都是在经济、政治、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全新角色(Padgett and Powell, 2012),所以谓之新,是因为历史上未曾有过同样性质、角色、关系、使命及作用的组织,它们给社会带来的结构

性改变,对于今天具有重大意义。

二、立基事实现象:隐藏的预设

针对社会事实的结构分析,不仅是一种分析方法,也是一种理论思想,一种特定的世界观,一种认识社会的方式。其中包含一系列预设,隐藏在结构分析的逻辑中。

(一)认识而非训导

作为一种认识方式,结构分析具有特定的思维及语言,它处理的对象虽是人的行为方式,但基本旨趣是认识而非训导。在面对实际现象时,结构分析注重区分简单条件、假设性条件和反事实条件,致力于发现事实、界定特征、辨别关系、寻找动因、总结定理的方式表达论点,而不是“服务于传达情态,评估行为举止,从而达到说服人改造人的目的”(沃迪,2019:30)。结构分析的目标是克制并约束性的,不是张扬和无限弥漫的,它的意图不是表达自己,而是探索未知。与日常的人际交往思维习惯不同,结构分析具有自我限定的律例,时刻意识到“思维沿着语言所设定的路径前行,一种语言是一个组织体,它系统地关注现实世界的某些方面,同时也系统地舍弃其他语言关注的那些特征”(沃尔夫,2019:15)。

(二)成分组合具有形态

结构分析视社会为系统复杂体,它呈现为不同的形态,可以被认识。比如,这些形态的特征,它们由什么成分(族群、角色、组织)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关系的性质,它们怎样互动、影响和交换资源,对于社会整体的作用后果,等等。如同面对求医的病患,需要收集各种信息,有些取得信息的逻辑是,察算命驱神,判定是否病人被怪物缠身;有些取得信息的逻辑是,看气象冷暖,问症病人的饮食起居,再关联到气象给出解释;有些取得信息的逻辑是,看病人舌苔、体温和脉象,根据中医理论诊断状况。而结构分析取得信息的逻辑符合实证科学原则:透视影像,化验成分,分析血液、体液发生的变化,增加或减少的成分是什么?和其他成分形成了什么关系?新的化合物是什么,发挥了什么作用?结果是什么?显然,病症是外部可现的,但成分

的组合关系和作用深藏体内,无法简单观望或由病人自己或者社会自身说出,需要结构分析的眼光和技术才能发现。

(三)行为预期和系统性影响

结构分析者预设,人类行为虽然差异万千,但共享某些一般性,比如追求生存安全、互赖交换、增进效率和理想目标等等。行为有重复再现可能,亦有特征及轨迹可以捕捉。集团或群体的行为受到结构分析重视,因为它覆盖广泛,有共享和扩散性,更容易影响广泛预期。社会提供预期激励,人们在互动中习得这一预期,并用它指导行动。难以想象没有预期指引的社会能够出现秩序,就好比乘客上了一辆出租车,他预期车会走向目的地而非他途,司机则预期乘客会付款而非逃走,在这样的共享预期下,租乘关系形成稳定的角色结构关系。这些预期虽然在刚上车的时候还没有实现,但如同隐形签约形成确定感,系统巩固着未来的社会秩序。这样,通过观测个人行为 and 整体的关系,结构分析得以捕捉对全局具有系统性影响的现象。

(四)特定经验与一般定理

所有结构分析都重视关联和差异。这些关联可能在各个层次上产生。既可以是经验中可见的,也可能是定义的种类——比如理想类型,这通常是一种基于经验提炼的形式化关系,用来揭示特征作为参照系。运用结构分析的人,既是经验主义者——主张经验证实,也是定理主义者——主张总结定理。二者相互联系,但位于思维的不同层次。假如我们画出一个纵向线,下端是经验世界,上端是分析世界,那么中间各个位置,都是研究者可以选择的出发点。在这个阶梯中,向上趋于简化,抽象性、形式化增加,走向规范和定理,向下趋于复杂,独特性、丰富性增加,走向多变的生活世界;由上至下,从高度简洁、抽象、一般,走向复杂、具体、独特(Nathan, 1993:923-936)。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关切的问题,选择较上部的位置,揭示规范原则的结构关系,比如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也可以略向下,了解科层制与君主制的不同属性,还可以选择更下部的的基础位置,发现现象层面的角色行为,比如农民和新生资产阶级、精英和大众、组织和成员的资源交换,等等。

无论抽象还是具体,结构分析都是针对群体现象的。有些社会现象显然不适合结构分析,比如一个人选择进一步深造,还是尽早开始职业生涯、积累工作经验和人脉,属于个人选择问题。但是如果讨论家庭或学业背景对选择的影响,结构分析就会有助于揭示一般性偏好——比如,收入不稳定的家庭多希望子女尽早工作,鼓励他们投入公务员、国企、教师等职业;如果要对比代际职业选择是否存在差异,以年龄划分的结构分析也能帮上忙。

三、消除机械决定论

有批评把行为预期和系统性称作机械决定论,假定社会像机器传动,某种结构就一定会出现类似结果。然而对史实的结构分析,已经消除了机械决定论。

比如,早在1966年,摩尔就注意到,在不同的历史时点,行动者作出不同的决定,引发连锁的后续事件,最终导致截然不同的历史形态(摩尔,2012)。斯考波尔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国家的差异反应之杠杆作用——国家崩溃、还是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局势,对社会革命的发生有重要影响(斯考波尔,2007)。在1996年的对话中,蒂利明确指出,帕森斯的范式没有时间纬度(Stave,1998:189)。基于历史事实的结构分析发现,一些结构的确定角色,事实上可以出现不同的作用(功能),例如传统的组织结构,并非仅仅对市场产生阻碍作用(彭玉生,2005)。法治的发展,不必然源自现代国家建设的推动。比如,英国皇家法院在12至13世纪变得更高效和专业化,成为英国现代司法体系的发展起点,但是这一变革的动因,不是来自现代法制观念的推动,而是一个实际困境——国家渴求财政收入——的意外后果(Simpson,2017)。显然,大量基于事实的经验研究,没有遵从特定结构具有特定功能的机械决定路径。

这些进展的一个贡献是,使结构分析离开机械论的限制,开启对实际后果甚至偶然性的关注,挖掘内生的偶然性如何影响了社会事件大局(Ermakoff,2015:64-125)。比如,根据市场转型理论的预测,中国朝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中,相对于市场的影响力,再分配的影响力将持续下降,否则无法解释发展效率为何提升。但中国的意外情况是,两种影响力并非呈现此消彼长、

正面冲突,而是出现迂回乃至合作共生的结构关系(张静,2019),表现为“政府即是厂商”(Walder,1995:263-301)。这些意外现象并非符合机械论,但却是社会的真实现状。

四、内生偶然及不确定性

自从马克思揭示了社会的结构性类别(比如阶级)对于行动选择(比如角色选择)的影响关系之后,一种业已存在的社会结构,就成为行动分析的预测的条件。但对于历史事件的研究发现,这一前提虽然有助于理解长程历史现象,可是对于突发重大事件中的行动选择影响,却被远远高估了。实际情况往往是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不存在先在稳定的结构,或者即使存在,它们也没有对事件发生根本性影响(Walder,2006:710-50),事件受到的突发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影响更为关键。

比如,在解释地方和国家的关系方面,多数研究曾长期重视中介(brokerage)体制的代理角色(broker),认为这种体制利于国家渗入基层共同体,从而取代地方庇护体系(paternalistic system),使地方政治团体嵌入并成为国家政治结构的一部分。广为人知的有关中国研究的例子是士绅角色和乡村讼师的研究(费孝通,2011;麦柯丽,2012)。

但为何国家政权建设,始终难以真正瓦解地方主义身份认同(localism/local identity)?在国家强烈的权力竞争中,地方利益究竟是如何动员起来的?从预先的结构角色出发,无法通过具体的政治组织化过程挖掘,解答上述问题。针对这一局限,结构分析另辟蹊径,从结构的缝隙(社会网络的密度和派系)出发理解真相。以沃蒙特镇(Vermont)历史信贷记录为根据,研究者发现,除了在团体间发挥作用的经纪人之外,还有一种协调者存在(coordinator),强化了派系内部的联系纽带。不同于经纪人在国家与地方纵向关系的位置,协调者活跃于共同体内部派系的结构洞,创建共同体内部的沟通,锻造具有地方认同的政治组织和权威高地,他们的行动稳固了地方社会关系集群,促进了地方联盟再度强大。这些本地经济网络中的有影响者,无论在地方还是国家网络中都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其作用远远甚于那些有很多外部关系、但却未能深嵌本地交换体系的经纪人(Hillmann,2008:287-331)。

显然,个人信贷造就的经济信用关系,给地方领袖在政治不确定环境中建立联盟提供了组织化途径,信贷关系构成的人际信任、互赖和忠诚,使地方共同体在政治上凝聚起来。它看上去偶然,但却属于内生的偶然性。不同于预先的稳定结构,内生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具有建构新社会关系的动态性,它们能够影响行动选择的形成,使之偏离预先结构的预期。这一进展,在理论上,使结构分析大大跨出了一步:不一定是先在的、明确稳定的结构关系决定角色选择,而是在政治或经济不确定条件下,角色选择可以构造新的社会关系生成,并依赖这一社会关系的确定性发挥影响。

五、社会中的国家

通对第三世界社会组织的历史研究,对国家的效能发挥提出新看法:影响国家效能的基础原因,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关联,以及双方交换资源的方式。国家虽然强大,但其效能无法独立于社会得到发挥。米格戴尔批评道,当我们沿着古典思想家、17世纪霍布斯《利维坦》开启的研究问题前进的时候——国家如何建立起全面的统治权威,它如何制定支配性的道德秩序,决定日常的生活关系,如何为社会订立经济议题,调度资源形成投资、确立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模式,等等,研究者不自觉地就把国家视为具有强大控制力量的有机体,并赋予其本体地位。但实际上,这些控制力量因其所处的社会组织方式而不同。因而,虽然找回国家很重要(斯考波,2007),但国家需要被定位于社会背景中,尤其是制度化水平有限的发展中国家。

这些不同,来自国家与社会在不同层次上的相互牵涉,国家经常不得不面对散布于社会多个领域的组织力量,展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随着国家目标和手段的变化,社会的不同反应可能彻底改变国家的能力。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社会组织是分散的,不是一个统一体,他们和国家的交流往往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比如,越是基层出现越多的信息阻塞和执行变通,国家的不同层级面对不同的压力,不易彼此协调一致,由于多重社会组织和国家交集的战略不同,之间有相互吸纳融入、抑或形成强制控制,这几种情况在不同的国家都有发生(米格戴尔主编,2017)。

大量的历史经验案例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巴西军政府受到历史上形

成的社会政治格局限制,缺少动摇地方的资源控制能力,反而加强了地方网络的广泛联盟,故在军政府对社会的改造中,国家的政治和财政集权归于失败(哈根皮安,2017)。印度国大党的经济改善计划也遇到无法凝聚社会共识的问题,缺乏党内支持,同时遭遇农民群体的反对(他们普遍认为这项政策真正的受益者是城市人口),政治决策中心与社会边缘之间,缺乏有力的系统性联系,位居乡村的领袖利用这个机会,动员农民反抗国大党,导致国家面对社会基础的低效能状态(柯里,2017)。在非洲,国家统治阶层在起源和利益上都不同质,国家推动的土地所有权变革,威胁到现有社会等级的团结,致使国家权力长期摇摆于碎片化的地方势力之间(布恩,2017)。随着联系或脱离的拉锯战频繁发生,以往的等级接触被横向联系所取代,形成了新的庇护关系,结果是国家的组织能力被进一步削弱(哈占,2017)。

这些经验研究展示了不同的结论:传统上被视为强大有效的国家,如何因重重限制缺少效力,社会自主性既可以是国家强大的来源,也可以是国家虚弱的根源(柯里、苏,2017),社会势力依特定环境——比如与国家的联系方式——而变化,等等。

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方面,这些研究的一项重要进展是放弃单一预设,将社会角色置于真实历史情境中,不是仅关注国家组织和社会的区别,而是追溯国家与社会的具体联系方式,包括行政体内各层精英之间,以及精英和社会势力之间的联系方式,了解政治联盟如何形成,他们如何组织、建立纽带,国家提供公共品的效能,如何受到社会聚合与分裂的影响(威默,2019:9)。

六、标准角色与历史形成

在原有的结构分析中,国家的角色和任务是给定的,具有一般的定义标准。但在实际历史经验中,不同的传统推动着国家角色的形成。如果以给定的国家角色为标准,那么中华晚期帝国历史的许多内容就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和国家“标准”的角色认知关系不大。比如,政治代表、战争和财政扩充……这些形成欧洲国家角色的重要因素,如果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情况会如何呢?(王国斌,1998:102)

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随着地区间的接触不断增加,冲突摩擦导致政治经济竞争大量出现。国家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竞争对手的军事攻击(王国斌,1998:93-94)。对付攻击维持武装力量的需要,基于征税的政治约定出现,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统治者需要钱,不得不接受缴纳者的要求,所以国家和社会各主体出现“抗衡”,借此定义各方的权利责任义务,成为国家角色形成的主题。作为两种主要的政治单位,贵族拥有财产,城市掌控商业和贸易,他们对皇权的从属很弱。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创造了有利于产生同意原则的政治环境:小规模和相对弱勢的统治者,让代议制度更容易建立(Stasavage, 2016: 145-62)。在英法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都曾要求王室承认贵族的参与权利,由此发展出欧洲的政治代表制度(王国斌,1998:115)。国家在扩大财力和官僚力量的同时,必须承认划界,释放不同于己的权力、做出政治承诺(合约),方能成功瓦解地方庇护网,越过旧的权威中介,建立直接面对个体的统治关系。

与此不同,中国国家面临的威胁,主要是提防内部的秩序瓦解,所以需要有效的社会控制。这种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儒家思想,作为社会控制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治理中作用极大。在政治方面,中国国家官员与社会精英之间的制度联系比欧洲强得多(王国斌,1998:101),运用科举制度吸纳、而不是排斥社会精英,地方精英和官僚成员共享一个意识形态体系,同样恪守儒家社会控制的策略。中国国家通过吸纳体制,很早就解决了贵族士绅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威胁问题,社会精英从未挑战国家地位,不存在二者需要相互妥协的诉求,地方精英一直是官方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辅助力量(王国斌,1998:115)。在社会治理方面,二者成为统治盟友而非对手,国家总是借用地方精英的力量,实现对地方的间接控制。它使用的手段主要有三类:意识形态手段、物质手段和强制手段(王国斌,1998:103)。这些中国特有的统治方法,和国家角色的由来,与其面临的基本问题有关。

在意识形态方面,国家把道德说教作为统治的基本方法之一,通过思想灌输和教化,试图消除异端思想的影响,将可能招致动乱的信仰定义为邪说,让精英和大众保持和国家一致的世界观,来配合统治。在物质利益方面,国家视农民安生为重大的政治问题,用帮助和照顾交换感恩,把都有农地耕作看成社会稳定的基础,把粮食供给当作维系农民生计的重点,所以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由国家管理粮食的储运和分配。在明清田面权(受

雇耕作者)和田底权(土地所有者)的冲突中,国家多持扶弱的意识形态,站在耕作者的立场判案,保护无业农民安于土地,而非支持有产者做大做强(步德茂,2008)。在强制控制方面,国家登记人口造册,限制迁徙,鼓励告发可疑行为,实施连坐处罚,要求社会关系尽监视责任,同时打击地方商业豪强,警惕他们偏离控制,垄断地方事项(Hung, 2008: 569-88)。上述国家的自我角色认知,来自历史及其面对的特有问题,而非国家的一般定义。

综上,基于历史的经验研究,虽然仍旧延续角色、组织、力量配置、社会关联等经典结构分析的立场,但论述程式已经不同:不是基于演绎和想象,而是基于经验证明,认识社会乃至国家的形态由来。这种改变,明显增加了社会结构分析的厚度,颠覆了其抽象又远离现实的旧疾,从历史现实的实践经验出发,结构分析获得了新的丰富性,改写了固有形象。

参考文献:

步德茂,2008,《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十八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布恩,凯瑟琳,2017,《后殖民时代非洲的国家与统治阶级:持久的权力矛盾》,米格戴尔主编《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第三世界的统治与变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2011,《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赵旭东、秦志杰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哈根皮安,弗朗西斯,2017,《传统政治对巴西国家转型的反动》,米格戴尔主编《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第三世界的统治与变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哈占,内奥米,2017,《接触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社团生活》,米格戴尔主编《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第三世界的统治与变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柯里,阿图尔,2017,《集权与无能:比较视野中的印度民主》,米格戴尔主编《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第三世界的统治与变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柯里,阿图尔,维维恩·苏,2017,《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论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竞争与妥协》,米格戴尔主编《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第三世界的统治与变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蓝培原,2017,《狮心王,十字军东征,和普通法系的起源》(知乎网),<https://zhuanlan.zhihu.com/p/32370552>(2017-12-26)。

李钧鹏,2016,《〈为什么?〉的理由(代译序)》,查尔斯·蒂利《为什么》,李钧鹏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麦柯丽,梅丽莎,2012,《社会权利与法律文化——中华帝国晚期的讼师》,明辉译,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

米格戴尔主编,2017,《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第三世界的统治与变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摩尔,巴灵顿,2012,《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王苗、顾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彭玉生,2005,《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宗族网络和私营企业》,吴慧婷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讲演稿。

斯考波尔,西达,2007,《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国斌,1998,《转变的中国——历史转型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威默,安德烈亚斯,2019,《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叶江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沃迪,罗伯特,2019,《亚里士多德在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休厄尔,小威廉,H., 2012,《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朱联璧、费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张弛,2020,《在疫情下历史地思考“事件”》(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382813)。

张静,2019,《回应社会变革:中国实践为转型理论提供了什么》,张静主编《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社会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Ermakoff, Ivan. 2015. "The Structure of Conting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1(1).

Hillmann, Henning. 2008. "Localism and the Limits of Political Brokerage: Evidence from Revolutionary Vermo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4(2).

Hung, Ho-fung. 2008.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and Elite Reproduction in Qing China: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Debate Revisit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3.

Nathan, Andrew J. 1993. "Is Chinese Culture Distinctive? A Review Articl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2(4).

Padgett, John F. & Walter W. Powell. 2012. *The Emergence of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tasavage, David. 2016. "Representation and Consent: Why They Arose in Europe and Not Elsewher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9.

Stave, Bruce M. 1998. "A Conversation with Charles Tilly: Urban History and Urban Sociology."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24(2).

Walder, A. 1995.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2).

——2006. "Ambiguity and Choice in Political Movements: The Origins of Beijing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 (3).

Is Structural Analysis Out of Date?
Research Advancement Based on Empirical Phenomenon
ZHANG Jing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structural analysi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how that, as a unique sociological analytic logic, structural analysis goes deep into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completes the shift from systematic deduction to fact proof: the focus from static abstraction to actual change, from presupposition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roles, from environmental certainty to endogenous contingency, and from logical inference to empirical proof, therefore it radiates new vitality. In this paper, some research literature is cited to show the advancement and their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Keywords: structural analysis; systematic deduction; proof by facts historical experience

(责任编辑: 闻翔)